

# 以高度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根基

林 辰

**摘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庄严使命，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文明走向的深刻把握。文化认同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情感纽带，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构建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契合的文化认同，须运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的文化认同困境，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民族国家主体与人类主体、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成员等文化认同面临的诸多复杂景观，全面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通过推进文化交往、共享文化资源、形成文化共识，进而在建构当代文化认同中巩固文化主体性，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坚实思想基础。

**关键词：**世界历史；全球化；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D61;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4)01-0045-07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sup>[1]</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既包含“怎么看”的认识论，又涵盖“怎么办”的方法论，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兼备的理论品格和思想特质，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作为“两个结合”的理论结晶和思想典范，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不断展开的、开放的思想体系”<sup>[2]</sup>。一方面，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文化实践，在不断回答时代之问中丰富理论内涵，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方向指引和方法论原则。

## 一、增强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作为新时代文化使命的重要内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出的时代强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推进这一使命任务离不开高度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现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课题“‘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内在逻辑及实践要求研究”阶段性成果；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课题“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与治理机制研究”（SZ2023D001）阶段性成果。

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对自身文化的情感依归、价值评判与行为遵循,表现为特定主体(个体或群体)对具体的语言、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接受、认可、归属与践行。文化认同具有身份确认、价值归属、群体确认、延续传承等功能,具体到民族国家层面,文化认同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情感纽带。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认同问题,反复强调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和基石作用,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sup>[3]</sup>，“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sup>[4]</sup>，“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sup>[5]</sup>等,这些重要论断为新时代塑造高度文化认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 (一) “古今中西之争”中的文化认同困境与调适

作为主体的思维活动和思想意识,文化认同是在对文化的比较和辨识过程中形成的,“自我”的本质总是在与“他者”的比照中确证并实现。在相对连续且同质的文化环境中,认同通常不构成困扰人们的问题,而内部动荡与外部冲击交织的状况则常常使人们的认同陷入困境。

鸦片战争让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面临落后挨打,曾经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遭到无情诘难。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开始在“启蒙”“救亡”“图存”“开新”等旋涡中奋起。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写道:“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sup>[6]</sup>。

所谓“古今中西之争”就是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与评价。综合实力上的悬殊使得国人“天朝上国”的自我认知崩塌,中国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分辨其优劣,哪些应该继承,哪些应该扬弃?对于西方文化,究竟如何积极借鉴,哪些应学习?哪些应剔除?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态度引发了近代“古今中西之争”: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复兴传统文化,固守“祖宗之法”;

文化虚无主义提出激进的策略,提出“全盘西化”;文化调和主义采取折中方案,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同文化立场和文化主张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剧烈碰撞、冲突不断,混杂的社会文化情境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化认同危机。

这种文化认同危机随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得到疏解,尤其新中国的成立,驱散了近代以来压在中国人心中“百不如人”的愁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出的蓬勃面貌和光辉前景更是使得文化认同达到空前高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认同问题的终结。转型时期的中国处在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样式。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成熟,社会不同群体间及其内部的思想观念日益活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明显,直到今天,阶层间的分化与重组仍在进行中。这种动态调适使得原有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人们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重新定位自身的社会角色与阶层归属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社会转型带来的急速变化,反映到心理层面,产生了彷徨、焦虑、无所依从的矛盾与混杂,从而动摇了原有的认同模式与价值信念。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已经进入全新的时空场域,全球化与现代性的交织互动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全球化时代,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总体性的变化,由以往的单一化、地域化和实体化日益转变为多元化、世界化和虚拟化,交往内容也由过去的商业往来为主转变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交往。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一个“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世界的空间”<sup>[7]</sup>,这种空间情境为文化的传播流通扫清了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障碍,传统的国籍界限被打破,人员的全球性流动、信息的跨国流通、教育活动的国际性展开,实际地拓展了人们的眼界,为人们的多样化选择提供了便利,但也造成了现实中选择的困惑。反映到理论上,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文化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等发展理念与社会思潮的矛盾与冲突，都以不同方式涌现出来。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的人类性张力日益突出，文化认同的再释与重建仍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

## （二）重塑文化认同的思想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sup>[8]</sup>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条件，一方面，来自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文化成就和文化创新，另一方面，来自先进文化观和科学方法论的正确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经验，形成了诸多规律性认识，这些深邃思想和科学论断为当前塑造文化认同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一是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正确认识自身文化是形成文化认同的思想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概括和提炼，既体现了对中华文明整体性的科学把握，也体现了对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深入思考。这一总体性的认识，不仅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以深厚的文明基础，同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为巩固文化主体性，塑造文化认同提供了丰厚精神给养。

二是始终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的主题主线，坚持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理依托，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高度关联，是同一心理活动的不同面向，二者相互影响，互为相互支撑。换言之，没有不认同的自信，也没有不自信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与充分张扬，为实现

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了坚实的信念基底。

三是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新的文化使命。文化认同来自对文化发展走向和发展趋势的信念与信心。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新的文化使命”这一任务要求，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sup>[9]</sup>。新的文化使命饱含人民情怀，体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方向；新的文化使命彰显自立自强，明确了党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文化发展主动权的职责所在；新的文化使命着眼人类命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积极汇入并引领人类文明发展主流，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前途命运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新的文化使命赋予中华文明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构建文化认同注入积极因素。

##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文化认同的复杂性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大历史观”考察国内国际形势，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对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从时间层面看，这一重大论断站位高远，考察的是较长时段动荡变化且当下仍在变化的历史时期；从空间层面看，这一重大论断着眼的“世界”，并非既定国际格局，而是具有丰富内涵和广阔空间的整个人类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将其视为指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发生的影响人类社会进程和发展方向的大转折、大事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调整，也是不同文化观念交流碰撞的过程，在世界经济重心“自西向东”位移中，如何看待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的关系、如何处理文化价值序位的排布、如何确定文化身份的指认，这些矛盾张力反映了当前文化认同问题面临的复杂情境。

### （一）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的矛盾

作为一个包含众多维度的范畴，全球化内在地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乃至管理全球化、教育全球化、交往全球化等众多方面。“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

之一，然而在对‘全球化’内涵的理解上，却见仁见智。例如对于经济的全球化，人们在心理上容易接受。但是，谈及文化的全球化问题，人们却讳莫如深，以至于将文化全球化和文化的多元发展视为一种矛盾关系。”<sup>[10]</sup>

文化全球化一方面带来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增加了人们的选择性，另一方面其普遍化趋势和倾向也对很多民族、国家的原生文化构成了挤压。对文化全球化的担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文化同质化倾向的担忧。如欧文·拉兹洛所说，全球化所形成的信息巨流对各民族文化构成了冲击，人们十分担忧自身文化是否会在滚滚“巨流”中被“稀释”，进而形成一种同质化的全球文化<sup>[11]</sup>。二是对文化殖民化倾向的担忧。由资本逻辑与商品流通夹带的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生活样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西方文化成为文化话语权的主导者在顶层对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展开了围猎。三是对自身文化安全的警惕。全球化时代捍卫文化主权，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后发国家必须面临的问题，因为文化资本与文化商品的跨境流通，文化产业的全球扩张，文化间价值的碰撞对后发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影响了后发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本土化一般是指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自身的传统，其中包括观念、符号、风俗等因素的推崇和张扬。全球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引发了广泛的抵制与不满，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特性进而巩固文化认同的基础，广大后发国家积极开掘并广泛宣传自身传统中的文化因素，力图抵制文化全球化的霸权主义倾向、殖民主义倾向和普遍主义倾向。本土化常常体现为个体为维护日常生活世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他者文化的进入主动抗拒。然而文化本土化自身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其主要问题在于把文化本质化、静态化、凝固化，进而忽视了其生长性的因素和发展性的因素。

事实上，全球化与本土化天然地具有一种共生关系，二者呈现出相生相长的互动状态。一方面，文化的同质化、普遍化，即特定的文化越过民族国家边界取得一种普遍性意义，异质文化逐渐被吸纳

整合到这种普遍性文化之中；另一方面，是文化的本土化和差异化，即人们对自身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礼俗仪式的重新尊崇。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本土性在某种程度上抵抗了全球化的文化压缩，脱离了国际商业文化的连接与规范，呈现了日常生活领域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人们在这种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情境中穿梭，身体力行地感受地域感与全球感的隐退与浮现，并由于亲历传统的流逝而对其愈发珍视，这种由同一与差异同场竞技引发的思维混乱，使得重建一种符合当代生活的文化认同成为一个亟待面对的问题。

## （二）民族国家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分殊

世界历史是各民族、国家普遍交往的历史，从各个方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性存在，传统的国籍界限被打破（自由择业、移民、入籍），甚至民族或族籍在族际通婚普遍发生的条件下都成了个人的一种选择。而在互联网形成的线上世界，由于信息的跨国流动，教育活动的国际性展开，人类的各种文化资源真正地展现了“人类性”，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变成了人类共同的资源，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活形式、观念、理论等都可以成为人们欣赏、爱好、批判的对象性存在。反映到理论上，全球化与本土化，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人类主义、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文化一元论与多元论，文化决定论与文化附属论，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涌现，各自都有其合理性，但又存在片面性。其实这些都表现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民族国家主体与人类主体的矛盾问题。

从群体的层面看，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文化冲突愈发频密，当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包括信仰信念、价值理念、生活习惯、审美情趣等）被卷入同一时空维度和同一现实场景之中，文化的差异性往往演化为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张力场之中。主体的复杂性，往往表现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人类之间的不同地位和不同利益诉求之中。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或群体利益与人类利益发生矛盾，孰轻孰重，如何选择，这不仅关系到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某一民族国家

与人类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看，不同的思想派别和理论主张就这一问题具有截然不同的主张和倾向。有的从个体出发，注重个人主体的需要和权益，如自由主义；有的从群体出发，重视群体主体的体验和利益，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有从人类主体出发对此问题展开，如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等。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认同问题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源自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其实质是民族国家主体与人类主体在价值理念、发展目标、生存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和角力。人们很容易在两极中游走。然而，这两种极端倾向并不可取，需要保持足够的警醒。因为执着于对民族国家的强调，容易陷入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窠臼；而执着于人类主义的关怀，则容易倒向空想主义的泥潭<sup>[12]</sup>。从这个角度看，民族国家主体与人类主体作为两种不同倾向，当两者重叠时，往往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部分，而当两者不一致时，往往是争议、冲突的内容。因此，关键是在发展中保持、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复杂平衡关系。

### （三）“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成员”的重叠

如果说，文化认同问题的复杂性源自于民族国家主体与人类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冲突。而在个体层面，文化认同问题的复杂性与人的多重身份的重叠紧密相关。比如，从血缘宗亲的角度看，每一个人，即独立的个体，但每个人一定处于某一家庭之中，这一家庭又处于某一族群（家族或民族）之中，这一族群（家族或民族）一定是处于某一区域、延承某一文化传统。以此类推，人的文化认同意识，既包含自身的体验，也包含家庭的影响，同时也有族群（家族或民族）的影响。我们把这一文化认同结构概括为以个人为中心的由小及大的同心圆结构。除此之外，对个体来说，一般还面对多重身份的重叠。人总是处于多种状态下多重身份的交集之中。我们把这一结构概括为多圆叠加结构。无论是“同心圆结构”还是“多圆叠加结构”，都将深刻影响人的文化认同意识。其中，对个体来说，“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成员”的重叠是最能体现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问题复杂性的一对关系，也是洞见文化认同背后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紧张互动关系的重要视角。对个体来说，与其“民族国家”身份相匹配的整套文化体系是其原初文化身份的基础，它与主体的“世界公民”身份相匹配的整套文化体系相背离、相冲突，将会导致个体心理上的焦虑和迷茫，产生无所依归，无所适从的认同危机。

### 三、建构当代文化认同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sup>[13]</sup>。文化离开了主体性，就失去了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更谈不上文化心理上的认同与自信。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对革命文化的继承中建立起来的，是在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上建立起来的，是借鉴吸收人类一些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一文化主体性深刻决定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内在地包含自信自强、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基本元素，决定了我们探索构建的文化认同是涵纳不同文化因子、整合不同文化资源、寻求达成文化共识的，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二元对立的，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同模式。

#### （一）文化交往的逐层深入

尽管当前“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思潮不断涌现，但无论如何，对话与合作已是不可回避的时代议题。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的各执一词对当代文化发展和交流构成了阻碍。对此风险，许多有识之士都有所关注，并积极倡导超越二者的局限，寻求一条文化发展和文化交往的合理路径。事实上，文化认同危机涉及复杂的情感依归和历史根基，体现了现实的利益纠葛和对生存空间的争夺，简单的学理分析根本无法解决这一文化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文化认同的达成只能通过各方的接触、互动与协商，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交往中得到动态的调节。而文化交往的深入展开，为冲出“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形成“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的内在统一，为多元主体的互动交往拓展空间。

历史地看，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散落在世

界各地的人们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无论在知识积累还是能力拓展方面都十分有限,特别是囿于山川河流、草原荒漠等自然屏障的阻碍,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不同文化间的交往十分困难。但随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科技手段的推陈出新和交通工具的更迭演进,丰富了人们的交往手段,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展开和深入,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迅猛普及,跨区域、跨民族、跨国家、跨时空的文化交往变得更为便捷,人们在交往广度、深度、力度、频度等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前所未有。在科学和技术飞速发展的强力助推下,人类交通手段和交往方式突飞猛进、不断迭代,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的、地域的、本土的文化受到来自全球化进程中异质性文化的影响、冲击和挑战。

全球化的整体推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存境遇,产生了许多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发展难题,如生态问题、恐怖主义、核威胁等,这种全球性危机的解决有赖于国际的深度合作,因而以开放交流的心态,吸纳具有人类共通性的文化因素到民族文化中来,形成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理想、价值尺度和实践标准具有重要意义。而当代民族国家要想在全球语境中谋求文化发展、把握文化安全主动权,必须积极参与文化交往,因为“任何一种文化意识,若不有意识地参与界定‘普遍性’的新含义,就是放弃为自己文化和生活世界正当性或合法性做辩护”<sup>[14]</sup>。因此,积极开掘并推广民族文化的普遍性因素,对普遍性的界定权的积极参与,不仅是维护自身文化安全实现文化自觉的要求,而且是达成文化认同的必由之路。

### (二) 文化资源的有机整合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共同体普遍面临着整合文化资源的历史任务。具体来说,这里的文化资源,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来理解。从时间层面来看,人们总是处于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总是处于新旧文化资源的演变之中。整合文化共同体内部自身的文化资源,意味着必须在整合时对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现状有整体性的把握,并且在构建层面,对未来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谋划。在空间层面,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共

同体之间的文化资源因全球化进程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在科技发展特别是交通工具和交流手段不断更新迭代的背景下,异质性文化的相遇在所难免。然而,这些差异性的文化资源的相遇虽然看起来是自发的,但往往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比如,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综合实力的差距,很可能导致双方的文化资源的相遇是不平等的。而推动跨文化交往,寻求文化资源的有机整合是摆在人类不同文化共同体面前的共同课题。

对中国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方面。甚至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与这三方面文化资源紧密相关。正是在三者的交织互动、相互影响、互促共进下,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既区别于传统中国,又区别于现代西方的适合中国发展的新道路。有机整合这三方面文化资源,成为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和共同愿景。无论是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还是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以及甘阳的“通三统”,都是对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的理论尝试。中国对于文化资源整合的努力和尝试,是对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及其延续经验的探索,或许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但是,对其他国家来说,特别是经历过激烈文化冲突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思考理路与方法模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并不意味着简单将现有的文化资源,通过“剪切”“复制”“粘贴”,就能直接拿来解决今天的社会现实问题。例如,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念和主张”解决今天的社会现实问题,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也需要在实际操作层面找到观念落地生根、思想开花结果的具体途径。

### (三) 文化共识的有效生成

对一个文化共同体而言,文化是维系其稳定发展的精神内核。从内部看,文化共识是这一共同体成员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方向的一致性立场、倾向和观点,包括相同或相近的信仰信念、发展理念、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审美情趣,

等。对这一共同体来说，其内部的文化共识是凝聚、塑造、传承这一共同体的生存方式、文化形象、精神风貌等共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主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不断生成文化共同体内部的集体共识，是提高这一文化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文化共识的有效生成，一方面基于对“如何理解文化传统”“如何对待文化差异”等相关问题的理论回应和解答，另一方面基于操作层面的文化实践。从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看，文化共识的有效生成，需要在体制机制层面做进一步的拓展和尝试。如果没有稳定的制度层面的支撑和保障，那么文化共识很容易成为人们头脑中的想象和愿景，很难成为落地生根的社会现实。

从制度层面促成文化共识的实现，关键在于探索建立有利于文化间交往交流的体制机制。一是要形成跨文化的对话交流机制。实现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文化共识，需要在制度层面建立相互之间充分平等、便捷高效的对话交流机制。二是要形成跨文化的互学互鉴机制。历史地看，文明间的往来互鉴常常能够促进文明的勃兴。罗素曾在《中西文明比较》一文提出：“在往昔，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向拜占庭学习。”<sup>[15]</sup>论述了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互学互鉴对于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文化共识和文化认同的形成同样至关重要。三是要形成跨文化的合作共赢机制。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间的交往交流需要以合作共赢为抓手，只有形成跨文化的合作共赢机制，才能持续深入推动文化间的良性互动、持续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古丝绸之路，和时兴，战时衰。‘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sup>[16]</sup>而中国积极倡导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为相关沿线国家之间建立文化交流、政治互信、经济融合的合作共赢机制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为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交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 参考文献：

- [1][5][8][9][1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 (17).
- [2]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 2023-10-09(01).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57.
- [4] 习近平.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M]// 习近平著作选读.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85.
- [6] 梁启超.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M]// 梁启超全集(第7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4030-4031.
- [7] [英]戴维·莫利等. 认同的空间[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56.
- [10] 邹广文. 全球化、文化个性与文化主权[J]. 贵州社会科学, 2010, (1): 8-10.
- [11] [意]欧文·拉兹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研究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M]. 戴侃, 辛未,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
- [12] 刘进田.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体结构、哲学建构方法及其意义[J]. 观察与思考, 2017, (11): 24-37.
- [14] 张旭东.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导论: 6.
- [15] [英]罗素. 一个自由人的崇拜[M]. 胡品清, 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8: 8.
-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511.

作者: 林辰,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 周修琦